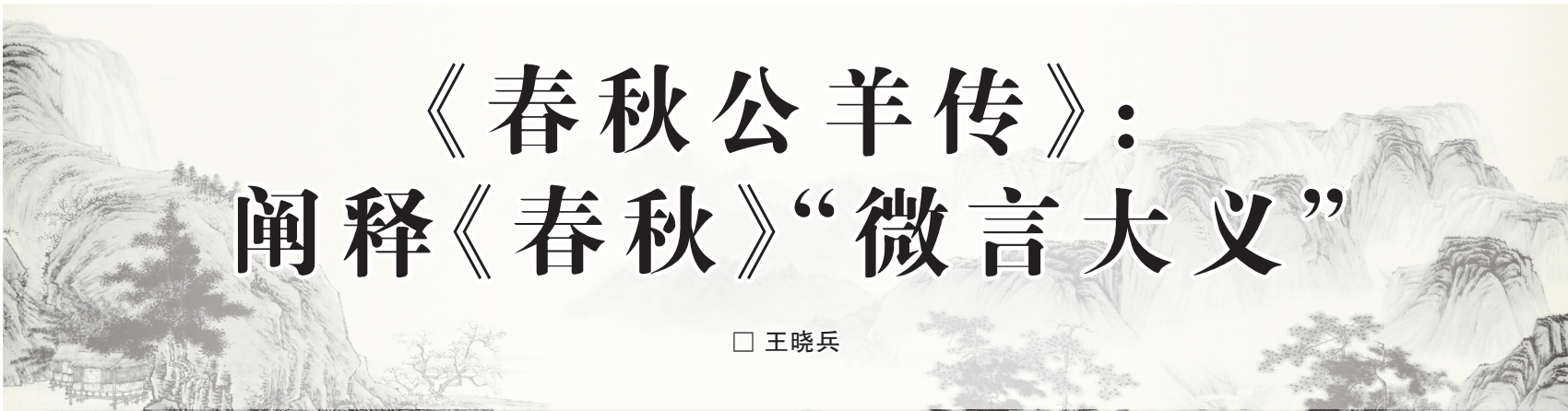




《春秋公羊传》： 阐释《春秋》“微言大义”

□ 王晓兵

《春秋公羊传》又名《公羊传》《春秋春秋》，是专门阐释《春秋》的一部儒家经典。《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上溯鲁隐公，下及鲁哀公，经鲁国十二君，历二百四十二年。因《春秋》经文言辞隐晦，表达极为简约，却饱含深意，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若无注释则难以理解，所以，后人纷纷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为其著文诠释的作品，被称为“传”。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此之前阐释《春秋》的共有五家，分别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而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时即已失传，后世相传的只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即著名的“春秋三传”。“春秋三传”注释《春秋》各有特色，而《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最着重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一部典籍，也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深、贡献最大者。

（一）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在《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中，班固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唐代颜师古《注》认为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是汉公羊寿，说法不一。关于公羊子，正史上没有发现其他记载。《春秋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意为《春秋公羊传》最早传与孔子的弟子子夏，子夏传与战国时期齐人公羊高……直至汉景帝时，由玄孙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考证，发现《春秋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并且还有“子公羊子曰”，更是作为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由此看来，《春秋公羊传》应该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最终写成定书。

（上接1版）

展现纾解难题、化解矛盾的政治智慧。“四下基层”是大兴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生动示范，是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把问题解决在源头、把矛盾消弭在基层一线，有情有理有法化解基层矛盾的科学工作方法。通过“宣传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从“声边”到“身边”，“调查研究下基层”化“脚力”为“能力”，“信访接待下基层”变“坐诊”为“出诊”，“现场办公下基层”从“机关会场”到“基层现场”，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搭建起党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四下基层”为我们树牢问题意识，更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破解发展难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探索基层治理服务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提供了智慧经验和科学启示。

彰显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历史担当。“四下基层”直面人民群众诉求和地方发展难题，是探索摆脱贫困的发展之道，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高招妙招，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注重实干兴邦、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担当，彰显了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精神风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统筹两个大局，系统回答“四个之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

（二）

《春秋公羊传》的体例形式，在东汉以前，经与传分别单行。《汉书·艺文志》分别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和《公羊传》十一卷。东汉末年何休做《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第一次把经文与传文合在一起，将传附在经文之后，从此《春秋公羊传》延续经传合并的形式。经传合并后，传文采用问答的方式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即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对这二百四十二年间东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发生的史事做了相应的阐释，按照鲁国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公的顺序编排。《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经文完全匹配，每句经文后面紧跟传文，传文采用问答的方式，通过层层设问、步步推导的方法，重点围绕《春秋》经文疏通其经义、阐发其大义，层层讲解《春秋》经文是如何“寓褒贬”“制义法”“明是非”的。《春秋公羊传》深明《春秋》大义，独得孔子真传，将《春秋》中的“大一统”等治世理想揭示出来，将《春秋》中孔子不明说的事件，将每一事件中所蕴含的言外之意，寓褒贬的微言，统统在《春秋公羊传》的条分缕析中，皆丝丝入扣地呈现在传文的解释当中。可以说，整本《春秋公羊传》，就是一部思辨的教材。

《春秋公羊传》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层层阐发事情原委的同时申明义理，讲明“微言大义”，与《春秋左传》以记载补充《春秋》未曾述及的历史史实为主不同。因此，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云：“《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文时不太注重叙述史实而侧重于属辞比事，从文字上寻绎经文书法的区别，探究经文深意的异同，比较、归纳、发掘其义例，从而阐发《春秋》大义。

（三）

《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思想对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底蕴。

的笃定信仰，以敢于正视问题的担当和敢于善于斗争的魄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学思践悟“四下基层”，能更加真切感悟领袖的超凡魅力和强烈的历史担当，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自觉摆脱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切实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在防范化解风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

用好用活“四下基层”这一重要法宝

“四下基层”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根植人民又造福人民，着眼实干又着力实干，立足时代又回应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作为区县一级，同群众联系最紧密、面对的矛盾问题最具体，也与群众心贴得最近最紧，最能检验实际工作成效。我们要传承弘扬好“四下基层”优良传统，以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推动党的方针政策直抵基层。习近平总书记任福建工作期间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党的声

孔子在《春秋》中表达了他的“大一统”思想，而《春秋公羊传》则首先突出“大一统”的民族观，并使它成为全书的中心思想。《春秋公羊传》主张尊奉王室，维护统一，阐释孔子在《春秋》中贯穿的“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这种思想体现了“大一统”学说中的政治统一说，它强调的是周天子在政治地位上的独一无二性。《春秋公羊传》十一卷。东汉末年何休做《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第一次把经文与传文合在一起，将传附在经文之后，从此《春秋公羊传》延续经传合并的形式。经传合并后，传文采用问答的方式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即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对这二百四十二年间东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发生的史事做了相应的阐释，按照鲁国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公的顺序编排。《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经文完全匹配，每句经文后面紧跟传文，传文采用问答的方式，通过层层设问、步步推导的方法，重点围绕《春秋》经文疏通其经义、阐发其大义，层层讲解《春秋》经文是如何“寓褒贬”“制义法”“明是非”的。《春秋公羊传》深明《春秋》大义，独得孔子真传，将《春秋》中的“大一统”等治世理想揭示出来，将《春秋》中孔子不明说的事件，将每一事件中所蕴含的言外之意，寓褒贬的微言，统统在《春秋公羊传》的条分缕析中，皆丝丝入扣地呈现在传文的解释当中。可以说，整本《春秋公羊传》，就是一部思辨的教材。

《春秋公羊传》还包含有历史变易思想，主张“三世说”，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不同的三个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

其他主要的思想内容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

（四）

《春秋公羊传》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显赫的地位。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建的视角来看，《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大的。公羊学派作为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是今文经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春秋公羊传》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兴盛，一次是在汉代，一次是在清代中晚期。因《春秋公羊传》传孔子《春秋》大义，主张“大一统”思想，符合西汉帝王稳定政权、尊王攘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需要，所以汉代统治阶级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一，将《春秋公羊传》定为官学经典，成为西

汉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据《汉书·儒林传赞》载，汉武帝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其《春秋》经博士只传《春秋公羊传》一家而已，而《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当时尚未被列为官学。因汉武帝好“公羊学”，董仲舒专治《春秋公羊传》，所著《春秋繁露》，皆言经义，且皆与《春秋公羊传》相合。董仲舒从《春秋公羊传》的立场所阐发宣扬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代以及其后整个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然而两汉时期的经学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来博取利禄，把公羊学和谶纬学说结合起来，而且将《春秋公羊传》的章句越讲越繁琐冗长，以至于几十万乃至百万字还不能传达大意。随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兴盛，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逐渐衰落。

公羊学派的重振是在清代中后期。在乾隆年间，学者庄存与著书重提公羊学说，宣扬《春秋》的“微言大义”，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何休所谓《春秋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议政、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自珍、魏源的传统。康有为、梁启超等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使“公羊学”成为晚清维新变革运动的直接思想武器。

总之，《春秋公羊传》注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主张维护统一、救亡图存、维新变革，倡导走向安康太平，饱含政治合作精神而又深具批判精神。当然《春秋公羊传》在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之时，也难免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处，应理性看待。



众工作法”“三研三管三落实”等经验做法，坚持放权赋能和减负减压共同发力、资源保障和队伍力量同步抓牢，有效落实领导包案、接访下访等工作措施，优化网格管理服务，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推动难点堵点问题现场解决。习近平总书记任福建工作期间，推动“现场办公下基层”，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现场办公”化被动接招为主动破题，是拉近群众距离、解决发展难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坚持“一线工作法”，把办公地点搬到街道社区、项目建设、生产生活一线，现场研究、现场指导、现场协调，能立即解决的就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想方设法尽快解决，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改进工作作风，持续跟踪问效，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久拖不决的历史遗留难题、制约区域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得到推动解决。

对标看齐推动“四下基层”常态长效

“四下基层”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创造，是我们组织做好群众工作、共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县委书记担负着领班子、带队伍、抓发展、保稳定的重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新时代新征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对标对表、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储存信息的方式从古代的石刻、兽皮、竹简、纸张，到现代的磁带、光盘、硬盘等等，不断迭代。然而，即便科技如何发达，目前信息留存最久的载体仍是把字刻在石头上。从古至今，中国人记载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都会以碑刻记载。就如一百多年前，胶州知州李翼清给百姓修了一通石碑，他离开胶州之后，百姓也给他修了一通石碑。

《增修胶志》记载，李翼清（1829—1894年），字彦之，清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至光绪七年任胶州知州，光绪七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五月复任。在胶州任职期间，他整饬风化、创新社会治理、建立教育长效机制，具有远见卓识，因治理有方，深得百姓爱戴。

光绪元年，兵灾之后的胶州尚未恢复元气，这一年恰逢李翼清来胶州任职。他关心民间疾苦，首先从整饬风化做起。到任伊始就告诉百姓，凡是有孝顺的男子、刚烈的女性、有节操的妇女名声被埋没的情况，都要去认真落实事情真伪，情况属实就行表彰。

任职期间，李翼清发现胶州的义塾已经毁于战火，存在当铺中用于设立书院的一万多两银子的当票也被毁了一半，而剩余的部分又被州署拿去当作兵粮团费以及修筑筑城费用，所以胶西、灵山两书院教育经费极为短缺，从而导致报考人数寥寥。李翼清就重新修缮东隅、西隅、南隅、北隅义塾四处，新添设灵山卫义塾、薛家岛义塾、七级义塾三处，还增加了胶西、灵山两书院的经费和乡试、会试路费。光绪三年五月，商人张健封慷慨捐助京钱六千，李翼清把其中两千作为士子乡试路费，息本一千作为士子会试路费，息本三千作为书院经费。按照一分二厘的利息放入当铺中，并且规定这些息本无论何种公事都不准挪用。为了确保这项政策保持下去，李翼清特地立了一通石碑，将其记录下来。

李翼清认为，对于学子来说，必须摆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况，每个读书人都应该了解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此，李翼清聘请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注重培养学子经世致用的才能。他规定把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一门课程，希望多一个读书之人就多一个世事洞明的人，为地方社会发展服务。

李翼清自己捐库平银五百两，京钱一千，利息和本金合起来每年可再得利息，这些利息用来支付老师的酬金和城乡七处义塾的费用，不够的部分由李翼清捐赈养廉银填补上。李翼清通过刻文立碑的方式，希望能够把这项政策传承下去，让继任的知州可以效法。

擒军攻打胶州之后，在官员们倡导下修建了围墙。但是多年过去了，当时修建的城墙都已毁坏断断续续，于是李翼清率领官绅百姓进行修缮，防止意外发生。

光绪二年春，李翼清奉命在沿海种树作为屏障。胶州海岸长，为完成任务，李翼清夜以继日，勤于政事公务，细心认真规划，顺利完成了沿海种树数十万这一牵绊繁多的巨大工程，还因此得到了上级嘉奖，相邻州县也纷纷效仿他的做法。

两通石碑的故事

□ 潘晓 赵丽娟



这年春天，粮食短缺，谷物价格飞涨，商人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加上海上航道的商人认为税太重，不往胶州运送粮食。李翼清了解其中的原因后，下令马上平抑物价，又上书免除海上航道商人的粮食税，促进商人往胶州运送粮食。李翼清通过平抑物价和减免粮食税，使百姓获得了救济。

同年四月，蝗灾又起，李翼清号召民众捕捉蝗虫。为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李翼清规定，官府把民众捕捉到的蝗虫购买下来，这样百姓捕捉蝗虫的积极性大大提升，蝗虫也很快被消灭。蝗虫虽然被消灭掉，但是因为蝗灾造成麦子歉收，强盗蠢蠢欲动，有的甚至聚集起来抢夺粮食。李翼清把他们的首领锁之以法，老百姓得到安定。

光绪五年，李翼清发现胶州发生水灾都是因为云溪河、墨水河淤塞导致，就筹集巨款疏浚，从此改变了水灾频发的状况。

据《山东通志》记载，李翼清历任山东肥城、胶州等知县、知州，兖州同知，光绪十四年（1888年）升东昌府（山东聊城）知府，山东候補道。任职期间，他始终勤勉为民，德政泽被百姓，受到广泛称赞，被称为“能吏”。《增修胶志》记载：后来百姓感念他的德政，为他立“李公德政碑”。

两通石碑，一个故事，记载了“政之所要，在乎民心”的政德之本，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民心所向。

避难，既要善谋全局当“指挥员”、又要干在一线当“战斗员”，大力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勇于迎难而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坚持唯实求真的实干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问题，更是党性问题。新征程上，必须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历史耐心，既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问题，积小胜为大胜，又放眼长远，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凝心聚力、精准发力、集中精力做好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发展和安全、全局和一域，一级带着一级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永葆自我革命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新征程上，牢记“三个务必”，秉持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心态，保持无私无畏无悔的精神，树牢靠作风吃饭、拿实绩说话的鲜明导向，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注重在一线磨砺干部，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系天津市南开区委书记）